

# 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 ——基于Y市N县的调查分析

唐志远 蔡依婷 邓江爱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湘潭 411105)

**摘要:**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 以Y市N县为调查对象, 引入公众参与的中介变量和社会支持的调节变量, 构建农民数字素养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 农民数字素养对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公众参与在农民数字素养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社会支持正向调节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因此, 通过从技能和知识层面强化农民数字素养培育、优化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参与体验、营造社会高度支持的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环境, 可以有效提升农民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关键词:** 数字素养;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获得感; 公众参与; 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 G249.2; G253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23.07.005

**引文格式:** 唐志远, 蔡依婷, 邓江爱. 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基于Y市N县的调查分析[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3 (7): 40-5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作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是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手段, 其最终目标是满足公众基本数字文化需求, 以提升人民群众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当前, 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 处于信息末端的大多数农民在数字素养方面存在数字接触率偏低<sup>[1]</sup>、数字化技能匮乏<sup>[2]</sup>、数字资源利用不足<sup>[3]</sup>等问题, 造成广大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较低, 难以共享数字化时代下公共文化服务的精神盛宴。因此, 探究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作用机理, 不仅是提升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现实需求, 亦是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的重要议题。

## 1 文献综述

当前, “获得感”已成为衡量社会供给满足民生需求程度的重要指标<sup>[4]</sup>。在公共服务领域, 获得感是公众感受到的共建共享发展过程中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受益程度<sup>[5]</sup>。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文化供给, 不仅事关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和美好生活需要, 也是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的重要手段<sup>[6]</sup>。从现有研究来看, 学者主要从结果与过程两个方面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相关研究。前者认为公共数字文化设施的完善<sup>[7]</sup>、服务供给内容与形式的优化<sup>[8]</sup>、平台信息规制和制度保障<sup>[9]</sup>能够影响公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验与获得感知。后者则将个体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参与表现<sup>[10]</sup>、公

收稿日期: 2023-05-22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的伦理风险防范研究”(编号: 21CZZ052)、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激励机制研究”(编号: XSP20YBZ163)资助。

共文化服务人员与公众间的双向互动<sup>[11]</sup>、用户体验过程<sup>[12]</sup>看作公众文化获得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除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农民的数字素养也深刻影响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在农村数字化发展过程中, 农村居民选择什么样的知识信息、如何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利用与主体内在的认知结构密切相关<sup>[13]</sup>, 这一认知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最大限度地表现为数字素养, 而数字素养的主体建构要素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有效利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sup>[14]</sup>。杨芳等<sup>[15]</sup>基于扎根理论分析发现, 农民“技术接受”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契合的前提。王镒等<sup>[16]</sup>认为用户信息素养不足, 导致其无法有效利用乡村数字文化服务, 限制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持续使用的意愿, 从而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的提升。华钰文等<sup>[17]</sup>以“国家公共文化云”为例, 发现老年用户对使用方法不熟悉而无法建立与数字技术的信任桥梁, 其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价值的感知受阻。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知, 数字素养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 但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在研究对象上, 已有研究主要从政府层面探讨公众公共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直接聚焦于政府的服务对象——公众, 但未涉及农民这一群体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影响机制。在研究内容上, 已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关注数字技术使用对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影响, 鲜从数字素养角度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基于此, 本研究选取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湖南省Y市N县的下辖乡镇展开调查并获取数据, 引入公众参与的中介变量及社会支持的调节变量, 探讨农民数字素养对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 以期提升农民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提供有效策略。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2.1 理论基础

“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在《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理论》一书中正式提出。其核心观点认为, 人的活动是由个体行为、主体认知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三种要素交互作用决定的<sup>[18]</sup>。其中, 主体认知发挥着关键作用, 对处于社会情境中的个人做出的行为判断与

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社会认知理论构建了影响认知的主体因素、环境因素、行为因素的基本模型, 并构成了影响因素研究的雏形<sup>[19]</sup>。特别是在数字乡村建设情境下, 农民的数字认知过程会影响其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意愿与行为, 从而形成对事物的态度和评价。

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以政府为主导, 多种参与主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满足农民基本公共数字文化需求及保障其基本文化权益的方式。获得感是个体对自身需求的内容、满足途径和所需条件的认知评价与心理体验<sup>[20]</sup>。因此, 农民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是农民个体对于所接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客观获得状况产生的主观感受, 反映了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绩效展开认知评价的社会心理过程。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内容“三元交互决定论”认为, 个体的心理活动是由“环境—主体—行为”三种要素相互作用决定的。有研究表明, 在数字化时代, 数字能力较强的个体能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 并在数字化发展中拥有更高的获得感<sup>[21]</sup>。也有研究认为, 要提升获得感, 需要发挥社会环境支持作用, 同时也需要充分发挥个体参与在需求满足过程中的作用<sup>[22]</sup>。鉴于此, 本研究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 以“环境—主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 认为主体因素(数字素养)、环境因素(社会支持)与行为因素(公众参与)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提升: 一方面,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客观获得与体验价值的实现要求农民在具有较高数字素养的基础上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供给过程; 另一方面, 外部情境的支持作用也为农民获得更高层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动力, 激励其采取行动以获得更多服务资源与发展机遇。

### 2.2 研究假设

#### 2.2.1 数字素养与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对于数字素养的概念, 学界形成了“工具论”与“目的论”两种观点。“工具论”侧重于个体对数字技术的应用, 将数字素养看作数字社会成员与数字媒体及文化进行重要互动的工具和方法<sup>[23]</sup>。“目的论”则考虑了数字意识和态度层面, 强调数字素养是个人在数字社会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使用数字知识与工具, 做出明智决策以实现目标的能力<sup>[24]</sup>。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情境下, 数字素养具象表现为农民在接受与使用数字

文化服务方面表现出的态度与能力,与认知结构密切相关。数字素养直接影响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体验效果,即数字素养较高的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具有更强的获取、理解及运用能力,他们通过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参与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并适应农村数字文化生活。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sup>[25]</sup>,需求结构所显示的多层次需求与农民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在内在逻辑方面存在一致性。在数字赋权的支持下,农民的文化生活展现出积极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建构的倾向<sup>[26]</sup>。这不仅影响着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资源的可及性感知,对服务情景安全性、互动性与公平性的感知,还影响他们受参与动机驱动的目标实现感知。从农民数字素养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关系来看,信息化意识和使用能力是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提升的前提<sup>[27]</sup>。因此,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能够促使其利用数字技能表达自身文化需求,并更愿意接受和主动利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效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故提出以下假设。

H1: 数字素养与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显著正相关。

## 2.2.2 公众参与的中介效应

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公众参与是终端使用者反馈感知服务效果的关键环节。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涵义主要包括公众使用服务与反馈效果的自觉性以及公众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内化为日常的行为习惯<sup>[28]</sup>。Whitaker<sup>[29]</sup>指出,许多公共服务需要一般公众的积极参与,尤其是那些即将成为服务的直接受益者的参与。农民作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直接受益者,其参与程度不仅是衡量农村居民文化获得感的内在标尺,也是彰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的外在标志<sup>[30]</sup>。依据社会认知理论,主体内在的认知结构对处于外部环境中个体的行为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农民数字素养提高后,其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认知水准与使用技能提升,其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行为决策能力也会变得更强。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 数字素养与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显著正相关。

有研究指出,通过公众参与公共服务,能够缩小实际体验与期望之间的差距,获得较高的感知质量及满意度<sup>[31]</sup>。因此,农民作为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公共数字文

化建设,有助于缓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和公众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sup>[32]</sup>,进而改善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感知绩效,助推其获得感的提升。与此同时,农民通过实质参与可以深刻体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的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满足个体自我价值实现与社会交往需求,加深对文化获得感的感知<sup>[33]</sup>。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 公众参与对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得出,数字素养的提高能够促进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过程。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意愿越强,越能增强所具有的数字技能以获得更多服务资源与效能体验,从而产生较高级别的文化获得感。因此,提出以下综合性假设。

H4: 公众参与在数字素养与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 2.2.3 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

社会支持是个体凭借其拥有的社会网络而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可满足其基本社会需要。在社会学视角下,社会支持的客体通常是弱势群体<sup>[34]</sup>。农民作为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弱势群体,在数字技术物理接入、操作使用等方面处于一定程度的不利地位。需要通过输入外部环境资源,缓解或消除农民因无法享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而衍生的“相对剥离感”。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内部认知会影响外部环境 with 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sup>[18]</sup>。作为认知变量重要成分的社会支持,能够发挥调节个体感受到的环境因素和社会适应性行为之间的作用,从而影响个体的获得感<sup>[35]</sup>。此外,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社会支持能够加强或削弱个体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参与意愿与行为,在其中起到调节效应,如冯献等<sup>[36]</sup>发现亲戚朋友、村内领导干部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推荐、宣传影响着乡村居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进而影响其参与行为。当农民认识到周围重要的人或组织支持其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时,就很有可能倾向于主动接触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使自身适应周围群体的期望以满足熟人关系的社交需求。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5: 社会支持在数字素养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之间发挥调节效应。

H6: 社会支持在数字素养和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



化服务之间发挥调节效应。

综上所述,在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路径(见图1)中须引入公众参与的中介效应和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这有助于得出更为科学的研究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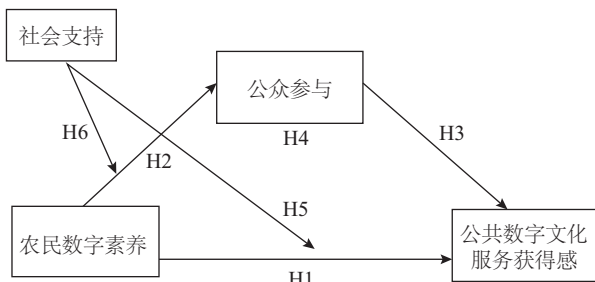


图1 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路径

### 3 研究设计

#### 3.1 问卷发放

在借鉴相关文献和调研问卷的基础上自行设计问卷。首先,进行预调研测试。在预调研阶段选取来自Y市N县的30位农民进行电话访谈及小范围问卷发放,了解农民对当地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提供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知晓与体验情况,据此对问卷的题项进行多次修改,形成自填式调查问卷。其次,通过线下纸质问卷发放与线上链接转发两种方式发放问卷。调查问卷题项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包括农民的性别、年龄、收入、学历、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知晓与使用情况;第二部分是农民数字素养的总体评价情况;第三部分是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公众参与、社会支持的总体评价情况。

#### 3.2 数据收集

选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较好,村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认知与使用水平较高的Y市N县作为调查点。2021年8月,湖南省Y市被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确定为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在这一政策作用下,当前Y市所辖县N县已形成了以县图书馆/文化馆数字化为基础、“两馆”总分馆和“村村响”数字服务为支点、县文旅云平台为核心的数字化网络。

该县图书馆建有4 TB储量空间的陈列硬盘中央数据库以接收上级中心传送的达2 TB的文化信息数据库,并储藏3万多种图书数据、100多种馆订报刊数据。建有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1个、共享工程流动服务点696个。同时该县还开设了“N县文化馆”微信公众号、“N公共文旅体云”等开放性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为广大公众提供了资源丰富、使用便捷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此外,全县410个行政村开通了“村村响”,18 000余户使用“户户通”,所有农民按需免费领取“户户通”设备,均可收看有线电视。鉴于此,在2022年7月20日至8月6日,于N县下辖乡镇发放纸质与网络问卷,发出600份。经有效性检验并剔除无效问卷后,总计获得474份有效问卷,有效率达到79.00%,基本符合预期。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知晓率较高,但使用频率较少。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基本信息	分类	样本量/个	比例/%	
性别	男	255	53.8	
	女	219	46.2	
年龄	≤22岁	105	22.2	
	23~34岁	92	19.4	
	35~47岁	142	30.0	
	48~60岁	118	24.9	
	>60岁	17	3.6	
学历	小学及以下	89	18.8	
	初中	145	30.6	
	高中或中专	139	29.3	
	大专及以上学历	101	21.3	
月收入	≤1 500元	118	24.9	
	1 501~3 000元	168	35.4	
	3 001~5 500元	117	24.7	
月收入	>5 500元	71	15.0	
	是否知晓	是	436	92.0
		否	38	8.0
使用情况	几乎不用	47	1.0	
	偶尔使用	275	58.0	
	经常使用	152	32.0	

#### 3.3 变量测量

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借鉴成熟量表来测

量主要变量,指标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设置“非常不符合”“比较不符合”“基本符合”“比较符合”“非常符合”5个程度,并分别赋予1~5分的分值。

自变量:数字素养。在借鉴罗强强等<sup>[37]</sup>、苏岚岚等<sup>[38]</sup>设计的有关数字素养量表的基础上,将数字素养划分为物理接入、信息搜索、沟通协作、数据安全、内容创造5个维度。

因变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借鉴钱力等<sup>[39]</sup>有关扶贫人口政策获得感调查问卷的基础上,构建物质获得感、社交获得感、公平获得感、安全获得感、能力获得感5个维度。

中介变量:公众参与。借鉴张晓<sup>[40]</sup>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中的用户参与行为的研究设计该变量,具体涉及内容获取、内容贡献、在线交互、监督反馈4个方面的参与行为。

调节变量:社会支持。从内容与功能角度,社会支持可划分为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工具性支持和社会陪伴4种类型<sup>[41]</sup>。借鉴孙晓宁等<sup>[42]</sup>对农村居民数字化支持的测量,将其划分为物质支持、政策支持和情感支持3个维度。在控制变量方面,因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等的调查对象在个体心理感知方面具有差异性,故将以上因素纳入作为控制变量。

### 3.4 信效度检验

使用AMOS 22.0统计软件检验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是否符合标准(见表2)。在信度方面,各变量的组合信度系数(CR)大于0.7,符合信度标准。在效度方面,平均方差变异量(AVE)大于0.5,且各变量平均提取方差的平方根均大于各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3),均符合效度标准。综上,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 4 研究结果

### 4.1 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路径

为检验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效应,应用AMOS 22.0软件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a(见图2,其中“\*\*”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其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为0.067,小于0.08;规

范拟合指数(NFI)为0.964,相对拟合指数(RFI)为0.952,增值拟合指数(IFI)为0.975,Tucker-Lewis指数(TLI)为0.967,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75,均大于0.90;卡方自由度比为3.104,小于5。各指标拟合度较好,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外因潜在变量“数字素养”对内因潜在变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 等于0.56,且达到0.01显著水平,说明农民数字素养正向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假设H1成立,且农民数字素养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平均值上升0.56个百分点。这也进一步反映出个体的数字素养越高,其越可能充分地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获取、社交娱乐、内容创造等活动来满足自身需求,并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资源中获得收益,进而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 4.2 公众参与中介效应的检验

为验证公众参与在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在模型a的基础上引入中介变量“公众参与”,构建了模型b(见图3,其中“\*\*”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其RMSEA=0.073、NFI=0.944、RFI=0.931、IFI=0.959、TLI=0.949、CFI=0.959、卡方自由度比=3.550,各指标拟合度较好,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首先,公众参与对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标准化系数为0.78( $P<0.01$ ),表明公众参与对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H3成立。这一结论契合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农民通过主动寻求更高品质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意见表达、情感认同以及自我价值的满足,从而增加积极心理感受,提升获得感。其次,数字素养对公众参与的标准化系数为0.50( $P<0.01$ ),即数字素养对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H2成立。这也进一步表明数字素养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进而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最后,对公众参与的中介效应进行Bootstrap检验,设置重复抽样5 000次,结果如表4所示。“数字素养→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中介效应的估计值为0.476,其95%置信区间为[0.372, 0.593],不包含0,中介效应存在,假设H4成立。这意味着公众参与在农民数字素养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显著,进一步反映出与农民所具有的数字禀赋

表2 变量类型及具体测量题项

变量类型		维度	具体测量题项	信效度
自变量	数字素养	物理接入	我拥有智能手机、数字电视、电脑设备并能接入网络	CR=0.836; AVE=0.506
		信息搜索	我能够使用网络工具浏览、搜索和选择所需要的信息	
		沟通协作	我能够使用数字化工具进行信息的分享、交流与协作	
		数据安全	我能够判断网络平台所发布信息的真伪并保护自己的隐私安全	
		内容创造	我能够通过整合相关数据创建和编辑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内容并发布	
因变量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物质获得感	我认为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供给内容很多样、供给数量很充足	CR=0.931; AVE=0.731
		社交获得感	我认为通过在微信公众号、网站、App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上留言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我认为在使用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中能收获来自其他人的尊重、支持和认同	
		公平获得感	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获得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带来的便利;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平等参与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活动	
		安全获得感	我认为在使用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中能够保护个人隐私;我认为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提供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	
		能力获得感	我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够帮助有关文化知识的增加;我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够满足有关工作、学习的需求	
中介变量	公众参与	内容获取式参与	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App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浏览、收藏、预约感兴趣的文化信息与活动	CR=0.897; AVE=0.686
		内容贡献式参与	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App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发起话题讨论或图文视频类的投稿	
		在线交互式参与	根据微信公众号、网站、App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进行线上求助、咨询、交流	
		监督反馈式参与	根据微信公众号、网站、App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进行简要评价或反馈服务改进建议	
调节变量	社会支持	物质支持	能够免费接入并使用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	CR=0.910; AVE=0.772
		政策支持	村干部经常开展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政策宣传活动	
		情感支持	我的家人、朋友、邻居都推荐我使用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美术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设施	

表3 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效度数据				平均值	标准差
	数字素养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公众参与	社会支持		
数字素养	0.711				3.39	0.67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0.493**	0.855			3.53	0.86
公众参与	0.440**	0.789**	0.828		3.48	0.73
社会支持	0.465**	0.577**	0.507**	0.878	3.55	0.79

注：“效度数据”部分对角线上的数值为平均提取方差的平方根；“\*\*”表示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且在0.01水平上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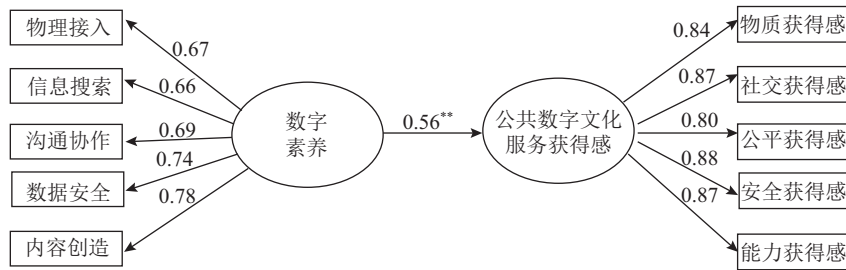


图2 模型a: 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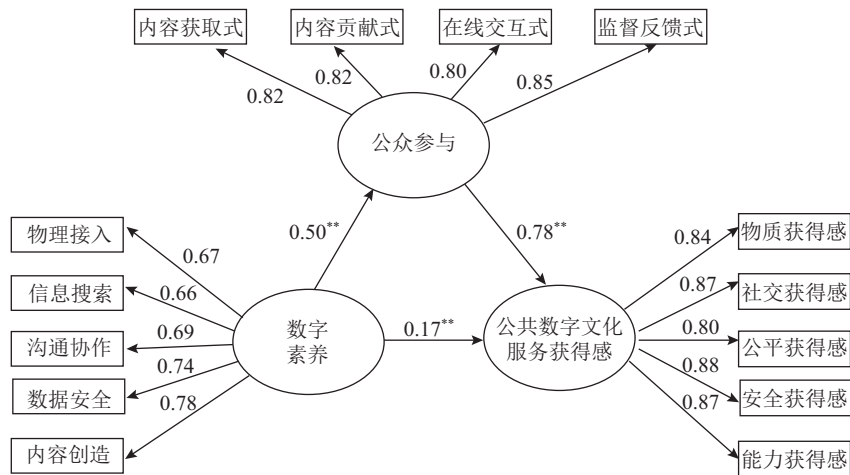


图3 模型b: 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中介效应路径

相比,其在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过程中收获的积极感受能有效增加其获得感。

表4 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

类别	估计值	效果量/%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0.205	30.1	0.101	0.307
中介效应	0.476	69.9	0.372	0.593
总效应	0.681	100.0	0.555	0.822

注：“直接效应”表示“数字素养→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中介效应”表示“数字素养→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 4.3 社会支持调节效应的检验

在控制性别、年龄、学历、收入水平、职业类型等的情况下,采用SPSS软件宏程序PROCESS的Model 8对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6)表明,将社会支持放入模型后,数字素养与社会支持的

交互项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及公众参与的预测作用均显著(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beta=0.098$ ,  $t=2.469$ ,  $P<0.05$ ; 公众参与:  $\beta=0.130$ ,  $t=2.616$ ,  $P<0.01$ )。假设H5、H6均成立,说明社会支持不仅能够调节数字素养、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中发挥直接调节效应,而且能够调节数字素养对公众参与的作用。通过进一步的简单斜率(Simple Slope)分析,由图4可知,对于社会支持水平较低(M-1SD)的农民,数字素养与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关系不显著(Simple Slope=0.065,  $t=1.383$ ,  $P>0.05$ );对于社会支持水平较高(M+1SD)的农民,数字素养对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增强作用(Simple Slope=0.196,  $t=3.508$ ,  $P<0.001$ ),表明随着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数字素养对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正向预测作用逐渐增强(见表6)。由图5可知,对于社会支持水平较低(M-1SD)的农民,数字素养对其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209,  $t=3.544$ ,  $P<0.001$ );对于社



会支持水平较高 (M+1SD) 的农民, 数字素养对其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Simple Slope=0.382,  $t=5.599$ ,  $P<0.001$ ), 且其预测作用较强, 表明随着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 数字素养对公众参与的预测作用呈逐渐增强趋势。此外, 在社会支持的3

个水平上, 公众参与在数字素养与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也呈上升趋势, 即在社会支持的推动下, 农民不断学会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新功能, 具备高数字素养的农民更容易参与数字化过程, 进而增强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表5 有调节模型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回归方程变量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 <sup>2</sup>	F	$\beta$	t
公众参与	性别	0.567	0.322	27.590	0.010	0.180
	年龄				-0.024	-0.711
	学历				0.001	0.030
	收入				0.023	0.656
	职业				0.009	0.406
	数字素养				0.282	5.225***
	社会支持				0.368	9.111***
	数字素养与社会支持				0.130	2.616**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性别	0.827	0.685	112.324	0.009	0.199
	年龄				-0.008	-0.278
	学历				-0.163	-0.649
	收入				0.057	2.019*
	职业				-0.362	-2.097*
	数字素养				0.121	2.736**
	社会支持				0.219	6.295***
	数字素养与社会支持				0.098	2.469*

注: “\*”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001水平上显著。

表6 在不同社会支持水平下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

类别	社会支持水平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下限	Boot上限
直接效应	2.751 (M-1SD)	0.065	0.047	-0.027	0.158
	3.550 (M)	0.131	0.044	0.043	0.218
	4.349 (M+1SD)	0.196	0.056	0.086	0.306
公众参与的中介效应	2.751 (M-1SD)	0.209	0.059	0.093	0.325
	2.751 (M)	0.295	0.054	0.188	0.403
	4.349 (M+1SD)	0.382	0.068	0.248	0.516

注: Boot标准误、Boot下限和Boot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估计的中介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M表示平均水平。

## 5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5.1 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 ①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和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农民应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技能素养越

高, 越能更好地从其中获得实惠与效用, 从而产生积极的心理感知及主观评价。而数字素养较低的农民则因信息认知与利用技能不足, 会形成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消极使用意愿与惰性行为, 从而降低其获得感。②公众参与在农民数字素养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即在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 农民自觉主动的参与行为能够加深对公共数字



文化服务认知并满足其发展需求,进而增强其获得感。  
③社会支持在农民数字素养、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中起直接正向调节效应。这一结论进一步契合了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即农民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认知与行为受到从外界获取的信息或知识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低社会支持水平下,数字素养对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个体对外部环境的感知有限,可能会因自身数字素养不高而产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规避行为,阻碍其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价值感知和充分利用,从而降低其获得感。此外,在高社会支持水平下,数字素养对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即随着农民社会支持水平的提升,数字素养较高的农民更容易利用其所具有的数字技能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使自身适应周围群体的期望以强化个体身份的认同感知,从而促进获得感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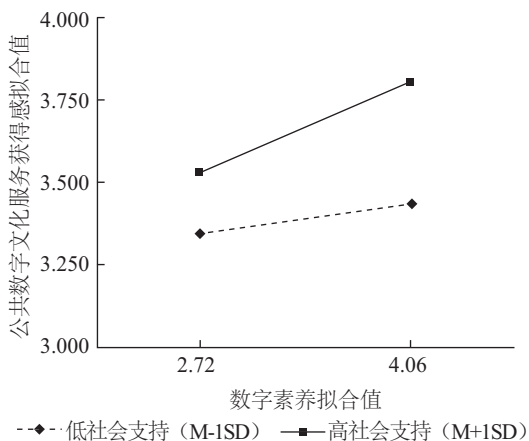


图4 社会支持在农民数字素养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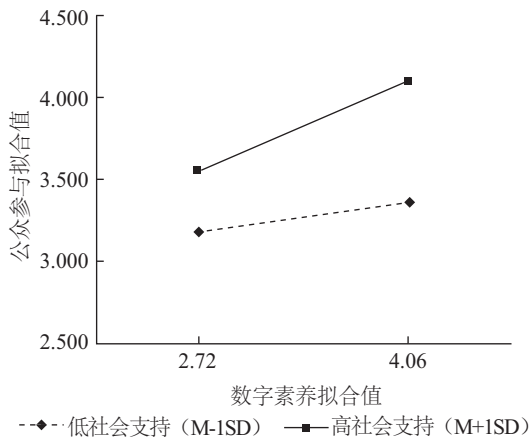


图5 社会支持在农民数字素养与公众参与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 5.2 对策建议

### 5.2.1 从技能和知识层面强化农民数字素养的培育

研究发现,当前农民数字素养总体偏低:在物理接入维度得到较大提升,在沟通协作、内容创造维度明显不足。首先,倡导家庭式数字反哺教育。积极推动以家庭为单位、代际互动的方式,鼓励子女主动向长辈传授运用数字工具获取智能服务的知识与技能,重点加强对数字社交互动、数字安全意识、数字内容创造的素养教育,从而增强农民融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情感价值。其次,充分发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宣传教育功能。基层政府运用门户网站、“村村响”广播、“两微一端”等的传播功能向农民科普宣传数字知识,同时邀请专家对公共文化云平台应用及特色数字资源进行讲解,以提升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认知能力。最后,完善农村数字知识及技能教育培训。一方面,通过搭建专业技术人才的交流平台,加强对乡镇公共文化管理人员数字化思维、数字化学习能力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系统培训,以便其充分运用泛在互联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深度学习技术等现代化工具对数字文化资源进行处理、挖掘、分析,从而为农村公共文化数字化管理与精准服务提供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组织动员社区党校、公益组织、大学生村官、群文工作者等参与农民数字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移动服务平台操作技能、信息检索与信息利用能力,以激发各类乡村文化艺人投身乡村数字文化资源建设,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富有活力和创意的乡村文化,有效增强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使用效能和获得感知。

### 5.2.2 优化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参与体验

研究表明,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参与意愿越强、参与行为越频繁,越能增强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积极感知与情感认同。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参与体验。首先,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应充分发挥农民主体地位,以农民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符合农村群体特质与内容偏好的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激发其主动参与体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积极情感与行为动力。例如,N县文化馆在深挖乡村文化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民族特色文化,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免费开展与乐器演奏、文

化遗产、民间风俗、戏剧戏曲等相关的文化讲座与艺术培训,更好地提升了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知晓度和参与度。其次,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要对农民的文化服务需求进行预测和积极引导,充分利用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方式文化众筹,对信息反馈渠道进行全面优化,以实现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民文化需求的对接,从而增强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效能感与认同感。最后,开展县、镇、村三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积分管理,对农民日常文化参与行为进行记录与评价。农民通过该平台动态了解自己的积分数量、村内排名、可享受的文化权益及村级文化活动信息。对农民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行为,如每日登录平台、图文视频投稿、建言献策、点赞评论等均可加分,农民可以凭借积分到村委会兑换基本生活用品、合作医疗补助等福利,积分亦可作为评先评优、享受有关激励政策的重要依据,以提高农民参与数字文化的积极性。

### 5.2.3 营造社会高度支持的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环境

研究证实,社会支持在数字素养与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效应。为此,要营造社会高度支持的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环境,以改善广大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感知绩效,进而助推其获得感的提升。首先,试点推行乡镇干部办事档案、工作日志、办事月报等,将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标准与农民满意度作为硬性指标列入服务主体的绩效考核,以提高其运用数字化手段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自觉性,提升乡镇、村基层服务点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应用水平。其次,加大对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经济投入。一方面,基层政府应通过合理谋划、统筹安排,将文化扶贫资金、县级配套资金、上级文化专项资金进行有效整合,实现数字文化项目资金高效化,为农村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及运营提供长期支撑。另一方面,通过税收减免或政策支持的方式,引导公众、企业及第三方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数字文化设施建设与运营,有效解决农村地区文化资源匮乏、服务管理僵化、使用体验不佳等问题,从而激发村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持续使用意愿。最后,推进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数字化建设。以县、乡、村三级文化馆、图书馆网络建设为依托,使分馆布局更加适应乡镇区域规划,提升

乡镇(街道)的数字化设备、图书馆、文化馆与县文旅云平台中心间的供需对接、人员互通、设施成网、资源共享的效能,从而为广大农民提供更优质的文艺精品与惠民服务,助力提升农民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心理效能感与体验价值。

##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以“环境—主体—行为”为分析框架,探究了农民数字素养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影响路径,厘清了公众参与和社会支持对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的作用机理,对助推农民共享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成果具有较强价值。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以个体主观评价衡量的农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指标与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契合,个体的心理感知存在差异,由此会产生一些测量偏差;另一方面,在数据收集方面,选取的调查区域为湖南省Y市N县,研究对象主要为农民群体,样本数据存在随机性,结论的科学性无法完全保证。在后续的研究中须考虑选取不同地区数据并增加调研样本数量,以更精准测度享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过程中农民内在心理感知的动态变化,从而提出针对性更强的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1] 常凌翀.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民数字化素养的价值内涵与提升路径[J]. 湖南社会科学, 2021(6): 114-119.
- [2] 殷浩栋, 霍鹏, 汪三贵. 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 现实表征、影响机理与推进策略[J]. 改革, 2020(12): 48-56.
- [3] 李五荣, 周丹, 李雪. 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3(10): 116-127.
- [4] 邢占军, 牛千. 获得感: 供需视阈下共享发展的新标杆[J]. 理论学刊, 2017(5): 107-112.
- [5] 于洋航.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生活满意度与居民获得感[J]. 西北人口, 2021, 42(3): 78-90.
- [6] 邵明华, 刘鹏.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供给: 价值意蕴、动力机制与路径创新[J/OL]. 图书馆论坛: 1-9[2022-12-1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20920.0943.002.html>.
- [7] 冯献, 李瑾. 数字化促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影响与作

- 用机制分析:以北京市650份村民样本为例[J]. 图书馆学研究, 2021(5): 19-27.
- [8] 姜雯昱, 曹俊文. 以数字化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供给: 实践、困境与对策[J]. 求实, 2018(6): 48-61, 108.
- [9] 陈世香, 唐玉珍. 政务微信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模式分析: 深圳“南山文体通”的个案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20, 64(17): 74-83.
- [10] 戴艳清, 孙一鹤.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得感: 内涵、评价体系与提升策略[J]. 图书馆学研究, 2022(3): 2-10.
- [11] 金莹, 闫博文. 基于文化治理视角的公共文化服务公众满意度研究[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3[2022-11-1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00325.1444.004.html>.
- [12] 陈则谦, 郑娜静, 李亚灿, 等. 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支持用户参与的服务现状、主要问题与优化建议[J]. 图书情报工作, 2021, 65(7): 78-89.
- [13] 张会田, 吴新年. 农村居民信息认知与信息行为分析[J]. 情报资料工作, 2011(6): 88-93.
- [14] 王猛, 华钰文, 陈雅. S-O-R理论视角下东部地区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用户流失行为研究[J]. 图书馆杂志, 2022, 41(2): 36-46.
- [15] 杨芳, 王晓辉.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契合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21(1): 62-69.
- [16] 王猛, 陈雅, 郑建明.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机理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8, 44(3): 35-51.
- [17] 华钰文, 王猛, 陈雅. 信任因素对老年用户使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影响: 以“国家公共文化云”为例[J]. 图书馆论坛, 2022, 42(7): 122-131.
- [18] 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M].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1985: 169.
- [19] 徐顺.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大学生数字公民素养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20] 董洪杰, 谭旭运, 豆雪姣, 等. 中国人获得感的结构研究[J]. 心理学探新, 2019, 39(5): 468-473.
- [21] 陈丹引. 数字获得感: 基于数字能力和数字使用的青年发展[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8): 50-57, 84.
- [22] 谭旭运, 董洪杰, 张跃, 等. 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结构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社会学研究, 2020, 35(5): 195-217, 246.
- [23] DU PREEZ M. Digital literacy: tools and methodologies for information society[J]. The Electronic Library, 2009, 27(1): 193-194.
- [24] SPANTE M, HASHEMI S S, LUNDIN M, et al. Digital competence and digital literacy i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systematic review of concept use[J]. Cogent Education, 2018, 5(1): 1519143.
- [25] MASLOW A H.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3, 50(4): 370-396.
- [26] 刘天元, 王志章. 稀缺、数字赋权与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 基于农民热衷观看短视频的田野调查[J]. 中国农村观察, 2021(3): 114-127.
- [27] 汤资岚.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村老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研究[J]. 图书馆, 2021(10): 9-15, 33.
- [28] 王猛, 陈雅, 郑建明. 政社联动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的作用机理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 2020(6): 44-53.
- [29] WHITAKER G P. Coproducti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service delivery[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0, 40(3): 240-246.
- [30] 陈庚, 崔宛. 乡村振兴中的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 特征、影响及其优化: 基于25省84个行政村的调查研究[J]. 江汉论坛, 2018(11): 153-160.
- [31] 范柏乃, 金洁. 公共服务供给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机理: 政府形象的中介作用与公众参与的调节效应[J]. 管理世界, 2016(10): 50-61, 187.
- [32] 完颜邓邓, 王文斐. 公众参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推进策略[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20, 29(3): 94-103.
- [33] 戴艳清, 李梅梅.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对公众文化获得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21): 3-13.
- [34] 陈成文, 潘泽泉. 论社会支持的社会学意义[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0, 29(6): 25-31.
- [35] 朱英格, 董妍, 张登浩. 主观社会阶层与我国居民的获得感: 社会排斥和社会支持的多重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 30(1): 111-115.
- [36] 冯献, 李瑾, 崔凯, 等. 基于信息生态视角的乡村居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图书馆建设, 2022(4): 139-146.
- [37] 罗强强, 郑莉娟, 郭文山, 等. “银发族”的数字化生存: 数字素养对老年人数字获得感的影响机制[J]. 图书馆论坛, 2023, 43(5): 130-139.
- [38] 苏岚岚, 彭艳玲. 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1): 34-50.
- [39] 钱力, 倪修凤. 贫困人口扶贫政策获得感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视角[J]. 人文地理, 2020, 35(6): 106-114.

- [40] 张晓. 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中的用户参与研究[D]. 保定: 河北大学, 2020. 3 (4): 593-611.
- [41] FLANNERY R B.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a methodological review[J].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990, 48 (3): 112-129.
- [42] 孙晓宁, 甄瑾慧. 农村居民数字贫困成因、状态及其关系结构研究: 基于山西省晋中市的田野调查[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2, 48 (3): 112-129.

## 作者简介

唐志远,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乡村数字治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E-mail: tangzhiyuan0524@163.com。

蔡依婷,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邓江爱,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乡村治理。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on Their Sense of Access to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Based on Survey and Analysis in Y City and N County

TANG ZhiYuan CAI YiTing DENG JiangAi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P. R.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with N county in Y city as the survey subject, the mediating variabl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of social support are introduced to construct the mechanism by which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affects their sense of access to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sense of access to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Public participa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their sense of access to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Social support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impact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on their sense of access to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Therefore, by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ills and knowledge, optimizing farmers'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in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and creating a highly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we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farmers' sense of access to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s.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 Sense of Gain; Public Participation; Social Support

(责任编辑: 王玮)